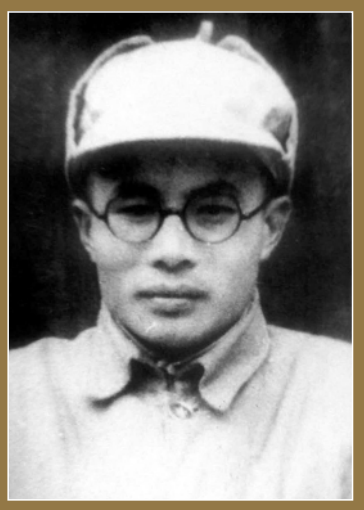
枪林弹雨中救活血肉模糊的战友

老红军要把红色家训进行到底



洪明贵　　受访者供图

老红军洪明贵：曾是“小看护”

儿子洪力：长征纪念日父亲给贫困学生捐款

“真的很抱歉，父亲这两天血压有点高，现在住在瑞金医院里。我们怕他情绪太激动，所以尽量不要打扰他。”原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的洪明贵是1918年7月8日出生的老红军，现年98岁。在小儿子洪力眼里，年事已高的父亲念念不忘祖国未来的花朵。“明天父亲要捐5万元给老区一所小学的20位贫困学生，每个人2500元，专款专用。27号我会代父亲到六安把钱送到贫困生手上。”

“这些年，我还加入了红军后代联谊会，通过联谊的形式传承父亲的精神，甚至还重走了长征路。父亲非常关心老区的爱心助学。早在2012年，他就向老区学校捐献了200台英文复读机。”洪力笑着说，别看父亲年近百岁，但当年却有三个“小”，一个是“小看护”，1931年参加红25军时父亲只有13岁；1939年父亲从卫校毕业后，担任刘伯承元帅的保健医生。那时父亲年仅20岁，个子小，被亲切地称为“小医生”；解放后，父亲担任中央卫生部医疗预防司司长，陪同苏联卫生部长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。周总理对父亲比较关心，问何时参加的红军，父亲说13岁就参加了红25军，周总理记住了这位“红小鬼”。后来父亲接待印度卫生部长时再次见到了总理，周总理一见面就喊我父亲“红小鬼”。

让洪力引以为傲的是，父亲所在的红25军有几个特点：它是长征路上最小的一支部队。1934年11月份开始长征，1935年最早到达陕北，在没有电台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，全靠决策向北走。25军都是年轻战士，善于打仗，领导都在前面冲锋陷阵。“让人惊叹的是，红25军在长征之初有2900人，到达陕北后变成了3400人，部队人数不减反增。到了陕北后，部队的装备、服装、钱款都比较宽裕。毛主席还曾向军长徐海东借2000大洋，徐海东送了5000大洋给毛主席。红25军在长征路上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，这是长征路上唯一建立根据地的部队。”

“给你讲几件趣闻吧。我父亲曾参加百团大战，当时部队俘虏了日本的一名军医，经过思想工作，该军医为父亲所在的队伍服务，还加入了共产党，改名叫白云。1960年，他作为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到广慈医院（现在的瑞金医院）来访问，邂逅了当时在医院当院长的父亲，他认出了我父亲。还说，‘洪医生，你认识我吗？’”

“长征中大小战斗上百次，最让我父亲刻骨铭心的是他经历的三场战役：独树镇战斗、庾家河反击战、四坡村背水之战。”洪力介绍说，红25军开始很顺利，先通过平汉铁路进入河南桐柏山区，又跳出包围圈挺进伏牛山区，当途经河南成县独树镇时，突遇寒流，气温骤降。部队遭遇了敌人的包围，一群年轻的战士不幸牺牲。危急时刻，军政委吴焕先赶到前面，他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，大吼一声：“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共产党员跟我来！”他高举大刀，带着交通队两个班冲进敌阵，和敌人展开白刃搏斗。士气顿时大振，战士们利用地形地物与穿梭而来的敌人展开战斗。副军长徐海东带领后续部队赶到，加入战斗。一番恶战，终于打退了敌人。晚上，又累又饿的父亲正想美美地睡上一觉，就被医院院长钱信忠给拽出来，跟上部队，在当地地下党的带领下，突出包围圈继续远征。“我父亲后来才发现军领导的决策是正确的，如不连夜出发，天亮后敌人一旦反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1934年12月10日，红25军进入陕南，在庾家河开会研究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，一场恶战又悄然而至。“那场战役中，一颗子弹从徐海东军长的左耳根下穿入，右脑部穿出；程子华军长的双手被炸弹炸烂，血肉模糊。我父亲守着简单的药箱，用碘酒抹上凡士林再绑上纱布，靠着简陋的药品和医疗方法，昏迷数天的徐军长居然奇迹般地生还。”

洪力回忆说，解放后父亲曾作为第一批卫生领导干部到苏联考察，后来出任了中国卫生部第一任医疗预防司司长，开创了三级医院的划分，对中国医疗的改革做出了开拓性的尝试。

“父亲对我们子女的教育是要淡泊名利，所以我们四位子女没有人经商，从事的都是工程师、医生、技术员等最普通的工作。父亲也一直教诲我们要传承红军精神，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。”洪力说。

胡守富　　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

“红小鬼”胡守富：曾四次负伤

儿子胡新华：我们希望让年轻人了解这些历史

1917年11月27日生的上海警备区原顾问、正军职老红军胡守富可以说是上海健在的最年长的老红军，今年99岁高龄了。老人的身体不错，一直住在长征医院的他前不久还接待了一群慕名而来的大学生。昨天，他精神气十足地在本报记者的面前穿上军装，戴上勋章，迎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。

他1931年8月参加红军，历任红三军司号员、班长、排长、团长，参加了五次反围剿作战，爬过雪山和草地，从枪林弹雨中走来，对现在的生活倍感珍惜。从一名红军小战士成长为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，胡守富经历过上百次战斗。曾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、三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。1936年，他随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，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，随后又参加了平型关、阳明堡、百团大战、鲁西南等著名战役战斗。

年近百岁的胡老听力有些下降，隔三差五就会探望父亲的大儿子胡新华自告奋勇当起了“翻译”。“父亲七八岁时，成了孤儿，不得不到地主家里放牛，12岁时，父亲生了褥疮，被地主赶走了。当时村里有个小名叫‘小东子’的孩子被收进了部队，父亲的小名叫‘大东子’，他不服气问红军干部‘为何收他不收我’，双方争执时巧遇路过的贺龙军长，特批参军，于是我父亲就留在军部里当司号员，主要工作是吹号。”

“吹了三五年号，父亲开始跟着部队打仗。当时他成天和贺龙军长在一起，深受军长喜爱，贺老总一高兴，就会用烟斗敲他的头。”胡新华介绍说，“1935年，父亲所在的红二军团开始长征，每名战士都背着粮袋，条件好的时候粮袋里有炒熟的大麦、黄豆。过草地时，很多人饿极了，便抓起干粮大把大把地吃，但父亲每次只吃几粒粮食，这正是他能走出草地的‘小秘密’。但后来还是断炊了，食树皮和草根是司空见惯的事，听我父亲说，有一次过草地时，实在没吃的了，贺龙军长见伤病员和‘红小鬼’们快撑不下去了，还把一匹马杀了。爬雪山的时候很艰苦，大家怕滑倒，手拉手，下山的时候，有人把背包垫在屁股下，从山上滑下来。这种苦是现代人不可想象的。”

“我们在家吃饭时，他吃饭的速度非常快，我们问他，‘你吃那么快干吗？’他回答说，‘战争年代，如果吃得慢就赶不上队伍。’他到现在都不喜欢喝水。因为当年晚上行军的时候，有人去方便后，一转眼大部队就不见了。”胡新华说。

胡新华说，因为没有亲历过这段历史，有些80后90后都不相信当年会那么艰辛。“我们希望让年轻人了解这些历史。几个月前，有一群大学生过来，他和几位大学生说，‘我现在有五个孩子，已经很幸福了，长征的路很不容易，很多战友都没看到新中国诞生。过草地爬雪山的艰苦，你们这代人感受不到。我女儿大学时入党，我曾让她到爷爷那里汇报。我父亲对她说，‘你是党员，和普通人不同，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，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。’”

胡守富还对大学生说，“我看到新中国的成立，也看到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富强，但我的很多战友却长眠在雪山草地里，他们为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献出了生命。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明白‘打江山’的不易，你们青年一代更要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。”

在长征途中，胡守富负了四次伤，中了许多炮弹和枪伤，到现在左腿走路都一瘸一拐的。一次战斗中，敌人的子弹从胡守富的前左大腿打入又穿出。按规定，伤员一般就地留在老乡家养伤，以免耽误部队行军，但贺老总得知胡守富负伤后，说：“这个小鬼还小，不能留下，要抬走。”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胡守富由几个战友用担架抬着走。途中，红军经常遭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，后来一名抬担架的小战士不幸牺牲。“当时部队里很多战士没有文化，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，直到现在我父亲都不知道他的名字，这也成了他最大的遗憾。

“我希望把我的一生经历向后代传送，像讲故事一样讲给他们听，使他们懂得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。在战争中，我负了几次伤，还能留下后代，他们也很幸福，教他们要保持革命的传统。”胡守富说。

（鸣谢黄泽晖、龙钢）